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

——以炉瓶之事为中心 *

袁　泉

内容提要　在新安沉船出水的两万余件文物中，以金属器和瓷器为主的仿古容器颇为引人注目。本文以这批数量最多、类型相对丰富的仿古炉瓶为研究对象，对比中国宋元遗迹和日本出土、保藏的同类文物，同时参考书画、文献资料，系统梳理新安沉船仿古船货的类型与组合，并对其适销对象、使用场所及用途性质等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新安沉船　仿古　炉　瓶　香花之具

在新安沉船出水的两万余件文物中，瓷、铜并举的仿古容器颇为引人注目。这批特殊船货的器类主要包括鼎炉、壶瓶、觚爵之属，造型特征与纹样装饰既追摹古风，又不乏新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目前对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的研究偏重瓷器窑口的辨识；而对这批仿古器物的关注和探究则相对匮乏，其仿溯原型、产地、受众、用途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展开。这批面貌特殊的金属制品是属于有目的的订货、采购，还是随意性购买的贸易品；出水器类与中国窖藏、墓葬的出土物在组合和面貌上有哪些异同；日本的传世文物和考古发现是否有与之相互印证的材料；其在中国宋元及同时期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以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为切入点，以中日出土文物和传世品为补证材料，推断这批仿古船货的用途与性质，继而探讨以炉瓶之属为代表的宋元仿古器物的使用场合与组合样态。

一　异同的启示：新安沉船仿古器物与中日出土、传世文物的比较

新安沉船仿古制品的大量出水，为我们探讨14世纪前半叶[1]元代铜、瓷仿古容器的时代面貌提

*　本研究所到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蒙元时期墓葬”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3CKG015）。

‹1›　新安沉船出水的360多件木简被认为是分辨订货人的标签，其中有8件上有元代“至治三年”（1323）墨书；沉船出水铜钱中年代最晚者为元至大通宝，始铸于至大三年（1310）；同时，出水有底面阴刻“使司帅府公用”的龙泉青瓷盘，此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其出现在大德六年（1302）之后。这些纪年材料均提供了新安沉船沉没的年代下限：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其沉没于14世纪前半叶。详见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席龙飞：《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日]三上次男：《新安海底的元代宝船及其沉没年代》，《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

书籍1.indb 69　14-11-20 下午2:09

供了珍贵的断代资料；通过分析新安船货与中日出土、传世品的异同，我们亦能找到沉船出水品的性质、用途及销售对象等问题所对应的答案。下文将从鼎炉和壶瓶这两类数量最多的器类入手，对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容器进行分类比较研究。

（一）鼎炉类

此类仿古器物在造型上既追仿商周鼎、鬲、簋，也取法汉鼎与博山炉，具体又可细分为香（熏）炉[1]、三足鼎式炉、四足方炉、鬲式炉等类。

1. 熏炉

这种容器设计意匠多取法汉器。新安沉船出水熏炉有博山炉和狮盖熏炉两类；这些器类不仅可在元代窖藏、塔基遗址中找到相似的参照文物，也可在日本出土品、传世品以及文献、绘词的载录中找到其东传轨迹。

博山炉：博山炉在两汉时期颇为流行，豆形器身上配镂空山形盖；博山炉盖在宋元时期仍在沿用，炉身形状则更为多样[2]。新安沉船出水的青铜博山炉〔图一：1〕为三足圆鼎状，肩部焊接两附耳；炉盖峰峦叠起，有镂空出香孔[3]。同样盖作山形的铜熏炉在四川简阳元墓[4]和剑阁小东街窖藏[5]中也有发现，但炉身造型各有不同。除博山形炉盖，元代窖藏中也发现了其他盖面造型的熏炉。如福建南平窖藏出土的鼎式铜熏炉〔图一：2〕，顶盖镂空，盖面焊接三条螭龙[6]。这一造型与《重修宣和博古图》中收录的“唐三螭鼎”十分类同。

就整体造型而言，上述新安遗物与南平窖藏铜熏炉最为相似，均作汉式三足圆鼎；其冲耳、鼓腹、蹄足的造型细节，恰与《重修宣和博古图》所载“汉辅耳鼎”的造型如出一辙〔图一：3〕。

狮子熏炉：炉身或炉盖装饰狮子形象是宋元熏炉的常见造型。新安沉船遗物中有一件整体造型作狮子状的铜熏炉，又名“金猊”〔图一：4〕。相似的铜熏炉在江西宜春窖藏[7]、福建南平窖藏〔图一：5〕和浙江海盐镇海塔天宫中均有发现，为14世纪前期的产品。元代的金猊制造传统一直影响到明

‹1› 香炉与熏炉之别，详见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页57。

‹2› 扬之水：《两宋香炉源流》，前揭注，页57－58。

‹3› 韩国文化财厅等：《新安船》II，图版：其他－26，木浦：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2006年。

‹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文物》1987年第2期，页70－87，图版捌：3。

‹5› 母学勇：《剑阁宋代窖藏综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页15－20。

‹6› 黄汉杰等：《福建南平窖藏铜器》，《南方文物》1998年第2期，页29－36，封二：1。

‹7› 前揭《福建南平窖藏铜器》，封三：1；李林：《海盐镇海塔及出土文物》，《东方博物》2009年第4期，页28－38，图12。

书籍1.indb 70 14-11-20 下午2:09

代；宣德年间，官方制作的彝器中就有大、中两种规格的狮形铜熏炉，榉制上承元器遗风‹1›。

宋元时期熏炉中的动物造型除上述“香猊”外，还常见“香鸭”等水禽的形象，以江西吉水南宋纪年墓(1254)出土的铜香鸭最具代表性〔图一：6〕‹2›。明代的铜、瓷仿古艺术品中，仍不乏此类禽鸟形香薰的形象‹3›。这种审美取向也影响到高丽和日本的工艺制造和收藏好尚。日本室町时代将军大名的收藏品中也可见铜香鸭的形象。记录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御所装饰陈设的《君台观左右帐记》中，就有“鸭香炉”的身影〔图一：7〕，其很可能属于明王朝的赠物‹4›。

顶盖装饰狮子的熏炉，又名“狻猊出香”‹5›。新安沉船出水的狮盖鼎式铜熏炉即属此例‹6›〔图一：8〕。相似的造型也见于同船的龙泉青瓷中〔图一：9〕。湖南常德元代遗址亦出土有相似类型的青花瓷炉，盖面蹲狮前足上举，形态与福建南平窖藏及浙江海盐镇海塔出土的金猊十分类似〔图一：10〕。

实际上，新安狻猊出香三足圆鼎的炉身造型在13－14世纪仿古文物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如福建泰宁窖藏出土的镀金银炉〔图一：11〕‹7›、江西宜春窖藏发现的铜鼎炉和南京明长春真人墓出土的铜炉‹8›。日本镰仓建长寺则保藏有一件元代龙泉青瓷香炉〔图一：12〕‹9›，除未配炉盖外，器形与新安狮盖铜炉基本一致，很可能是由建长寺营造船于14世纪前期带回日本的‹10›。日本崎玉县伊奈町大山遗址也出土此类铜熏炉〔图一：13〕，推测为14世纪中期以后的产品‹11›。

‹1› 《宣德彝器图谱》卷三：“大金猊炉，照元朝姜铸流金款式，高三尺六寸，重一百二十斤，用八炼洋铜铸成，周身蜡茶色，纯金流裹，实用赤金十六两，白银八两为丝片周身商嵌。下乘沉香木八角须弥座。”按，所谓“姜铸”，是指元代杭州姜娘子所制。关于姜娘子铸铜产品的记载，见(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上，“新铜器”条：“元杭州姜娘子、平江王吉铸铜器皆得名。”又(明)高濂：《遵生八笺》卷一四“新铸伪造”条：“元时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浙江省博藏有元姜娘子铭方炉一件，也可作为元代杭城姜娘子擅铸铜炉的佐证。

‹2› 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年第2期，页67。

‹3› 明代铜器生产中的仿古香鸭，见《遵生八笺》卷一四“新铸伪造”条：“近日淮安铸法古鎏金器皿，有小鼎炉、香鸭等物，做旧颇通，人不易识。”陶瓷中的相似产品则有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大明成化”款三彩香鸭，详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尘封瑰宝》，页82，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

‹4› 图片转引自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陶磁器の文化史》，千叶：历史民俗博物馆振兴会，1998年，图版II－32。

‹5›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二“陶炉”条：“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

‹6› 新安沉船出水狮纽铜炉、青瓷炉和狮子铜炉图片分别引自前揭《新安船》II，图版：其他－27、青瓷－108、其他－100。

‹7› 李建军：《福建泰宁窖藏银器》，《文物》2000年第7期，页65－70，图七。

‹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文物》2012年第3期，页22－30，图七。

‹9› 转引自前揭《陶磁器の文化史》，图版I－16。

‹10› 建长寺在元日寺社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据《广湘文书》、《比志岛文书》记，该寺的营造船1325年来华、翌年回国。转引自江静：《再谈新安船》，《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页68。

‹11› [日]高崎光司：《大光寺里——高崎线神流川桥梁关系埋藏文化财发掘调查报告》，琦玉县埋藏文化财调查事业团，1985年，转引自[日]久保智康：《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页144－145，图三。

书籍1.indb 71 14-11-20 下午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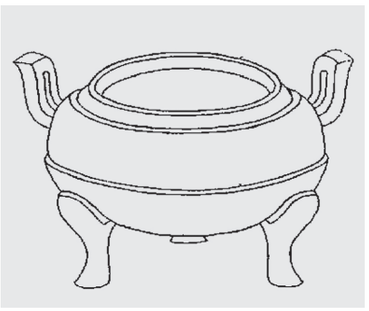
〔图一〕熏炉与出香



图一:1　新安沉船出水铜博山炉



图一:2　福建南平窖藏出土铜博山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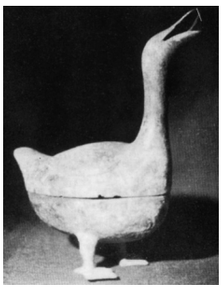
图一:3　《重修宣和博古图》"汉辅耳鼎"



图一:4　新安沉船出水狮子铜熏炉



图一:5　南平窖藏出水狮子铜熏炉



图一:6　吉水宋墓出水鸭形铜香薰



图一:7《君台观左右帐记》鸭形香炉



图一:8　新安沉船出水狮纽铜炉



图一:9　新安沉船出水狮纽青瓷炉



图一:10　湖南常德出土青花狮纽炉



图一:11　福建泰宁窖藏出土镀金银炉



图一:12　日本镰仓建长寺藏青瓷炉



图一:13　日本崎玉县伊奈町出土铜炉

书籍1.indb 72　14-11-20 下午2:09

2. 三足鼎式炉

此类铜器在造型上多取自古青铜圆鼎；新安沉船出水遗物有两件。其一双耳立于口沿上，直筒腹、圜底、三蹄足〔图二：1〕[1]。相似的宋元出土品在陶瓷器中可以找到旁证，如四川遂宁窖藏中的青瓷三足鼎式炉[2]〔图二：2〕。完全一致的铜炉虽未在日本发现，但崎玉县上里町大光寺裹遗址出土有三足铜炉一件，除不设立耳，其余特征均与新安遗物相似〔图二：3〕[3]。另一件口沿平折，上立两索耳，长领收束，圆鼓腹，柱状三足〔图二：4〕[4]。考察宋元遗迹出土物可见，此类造型的鼎炉在宋元窖藏和墓葬中均有发现，材质上铜、瓷〔图二：5〕并举[5]；而浙江衢州史绳祖墓出土炉形镜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13世纪后半此类鼎炉造型的流行〔图二：6〕[6]。福建南平窖藏和杭州浙大新村出土的文物[7]则展示了这一炉形的变体〔图二：7、8〕。这两处元代遗址发现的铜炉均作索耳、长领、鼓腹，与新安遗物基本一致，只是款足中空、呈袋状；其造型与《重修宣和博古图》所录“周慧季鬲”颇多类同〔图二：9〕。这种索耳、长领的造型元素不仅出现于三足炉上，也在四足方炉中多有应用。

3. 四足方炉

新安沉船出水有一件青铜四足方炉〔图三：1〕，平折沿，双直耳，高领微束，四方炉身，下承兽头蹄足，造型可溯自商周方鼎〔图三：2〕。同船遗物中另有一件龙泉青瓷方炉，口沿、炉身和蹄足等细节表现均与这件青铜四足炉十分接近〔图三：4〕。此类四足鼎式炉在宋代仿古铜器中并不鲜见，13世纪前后的出土物以浙江平阳黄石墓〔图三：3〕[8]和金华郑继道家族墓[9]中发现的四足铜炉最具代表性，只是炉身与新安铜炉的折方形不同，呈长椭圆形。元代四足铜炉的实例则集中出土于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遗址〔图三：5〕[10]和福建南平窖藏。其中南平窖藏共出土三件蝉纹铜方炉，造型

‹1› 韩国文化公报部等编：《新安海底遗物・资料篇I》页123，图153，首尔：同和出版公社，1984年。

‹2› 图片转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宋韵——四川窖藏文物辑粹》，页23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日]高崎光司：《大光寺里——高崎线神流川桥梁关系埋藏文化财发掘调查报告》，转引自前揭《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页145，图四。

‹4› 前揭《新安船》II，图版其他-28，页208。图版28。

‹5›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的青白瓷鼎炉，立耳、长领、鼓腹的特征与新安铜炉十分相似，只是三足为兽面蹄足。

‹6› 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页1004－1011。据墓志，史绳祖下葬于咸淳十年(1274)。

‹7› 浙大新村铜炉资料转引自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越地范金》页10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

‹8› 叶红：《浙江平阳县宋墓》，《考古》1983年第1期，页80－81。

‹9› 赵一新等：《金华南宋郑继道家族墓清理简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页54－61，图十一。

‹10› 资料转引自前揭《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越地范金》，页102。

书籍1.indb 73 14-11-20 下午2:09

〔图二〕三足炉



图二:1　新安沉船出水铜炉



图二:2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青瓷炉



图二:3　日本崎玉县上里町大光寺裏遗址出土铜炉



图二:4　新安沉船出水铜炉



图二:5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青白瓷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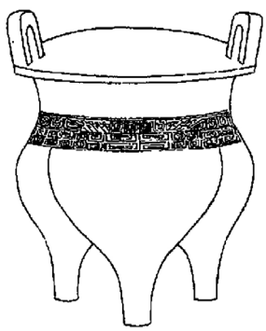
图二:6　衢州史绳祖墓出土鼎炉形铜镜



图二:7　福建南平窖藏出土铜炉



图二:8　杭州浙大新村出土铜炉



图二:9《重修宣和博古图》"周丁父鬲"

一致、纹样各异，其平折沿、长领束颈、附耳上冲的特点与新安铜、瓷遗物十分相似〔图三：6〕[1]。一海之隔的日本冲绳也保存有南平类型的四足铜炉。[2]从附耳的特征推断，其年代当在元明之际〔图

‹1›　前揭《福建南平窖藏铜器》，页30，图一：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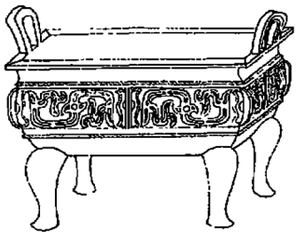
‹2›　资料转引自王牧：《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页143－156，转139，图二〇。

书籍1.indb 74　14-11-20 下午2:09

〔图三〕四足方炉



图三:1　新安沉船出水四足铜炉



图三:2 《重修宣和博古图》"周象簠鼎"



图三：3　浙江平阳南宋黄石墓出土四足铜炉



图三：4　新安沉船出水四足青瓷炉



图三:5　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铜方炉



图三：6　福建南平窖藏出土铜方炉



图三：7　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藏铜方炉

三：7〕。我们或可认为，四足铜炉在南宋阶段炉腹多做长椭圆形，元明时期则以委角方形为主。

4. 鬲式炉

新安沉船出水铜炉以此类数量最多，共计7件。其器形特征十分统一，均为侈口，索耳，浅腹，足中空。除一件通体素面无纹外，其他腹部均铸有纹饰，以二方连续的菱形作为构图框架，中心为梅花或乳丁纹突起〔图四：1、2〕[1]。此类铜鬲炉也广泛出土于元代南北方诸多遗址中，如江西宜春窖藏发现的两件"大德癸卯"(1303)铜炉，器形、纹样均与新安遗物同〔图四：3〕，则新安鬲式铜炉的铸造年代应与之相去不远，当在14世纪前期[2]。北京延庆窖藏亦出土相同形制的索耳铜炉[3]，腹部主体纹样为交颈双螭纹；从与之伴出的泰定元年(1324)"内府官物"款的朱漆大盘推断，延庆铜

‹1›　这种浅腹炉的定名目前尚有争议，也有将其称之为三足鼎式炉。实际上，鼎、鬲在造型上本就类同，考《重修宣和博古图》和吕大临《考古图》，二者可根据足的特点判分，"空足曰鬲，以象三德，盖自腹所容通于三足。"《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一九"鬲簋总说"条："《尔雅》以鼎款足者谓之鬲……汉志谓空足曰鬲，以象三德，盖自腹所容通于三足。"又《考古图》将北宋所见古铜鬲的底足分为明显分裆与圜底两大类，见吕大临：《考古图》卷二"丁父鬲"条："足皆中空……有足间若股膊然，三体合为一……有阔足为款者；有自下空为款者；皆圜而不分三体。"

‹2›　前揭《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简报》，封二：5、6；文中所用清晰版图片资源转引自前揭王牧：《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图二三。

‹3›　高桂云：《元代仿古龙纹索耳三足鬲炉》，《文物》1985年第12期，页87。

书籍1.indb 75　14-11-20 下午2:09

〔图四〕索耳鬲式铜炉



图四:1　新安沉船出水铜索耳炉



图四：3　江西宜春窖藏出土铜索耳炉



图四:5　新安沉船出水青瓷索耳炉



图四:2　新安沉船出水铜索耳炉



图四：4　杭州浙大新村出土铜索耳炉



图四:6　新安沉船出水青瓷索耳炉

炉的铸造年代多在14世纪前半。福建南平窖藏‹1›和杭州浙大新村元代遗址〔图四：4〕‹2›各出土了一件此类索耳鬲式炉，均装饰新安类型的菱形云雷纹构图和梅花突起，只是炉身器腹稍浅。

这种浅腹索耳鬲式炉在新安出水的龙泉青瓷中也不鲜见，腹部模印纹样均表现出与铜炉一致的菱形构图和梅花突起特征；炉身的深浅之别也与同船铜器两相对应〔图四：5、6〕。相似的青瓷鬲式炉也发现于浙江龙泉和温州地区‹3›。

目前日本虽未发现相同类型的出土或传世铜炉，但记录室町足利将军御所装饰陈设的《君台观左右帐记》(永正八年本，1511)，就图示了造型类似的香炉‹4›。作为传承有据的唐物收藏，不排除这种香炉或同类型铜炉在14世纪就作为舶来品传入日本的可能。

（二）壶瓶类

古之壶、瓶在器类指代上往往可以通用‹5›，根据口径、腹径比例和颈部长短在定名上各有取舍。

‹1›　前揭《福建南平窖藏铜器》，页33，图二：4。

‹2›　转引自前揭《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越地范金》，页107。

‹3›　分别馆藏于龙泉博物馆和温州博物馆，详见朱伯谦：《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图版178、179。

‹4›　转引自前揭《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西南沉船返航的性质》，页148。

‹5›　扬之水：《两宋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页50。

书籍1.indb 76　14-11-20 下午2:10

宋元以降，壶瓶类器物很可能是上古“尊”的从宜表现‹1›。新安沉船出水铜器中壶瓶类器物种类较为丰富，且形制相同者往往成对使用。沉船出水数量相对较多的壶瓶铜器计有温壶、投壶、贯耳壶和环耳壶四类。

1. 温壶

所谓温壶，即考古报告中提及的“蒜头壶”。《考古图》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在著录两汉古铜器时均对其有所提及。明代《遵生八笺》更对温壶的样制和名称沿革有清晰描述：“若古素温壶，口如蒜榔式者，俗云蒜蒲瓶，乃古壶也。”

新安沉船出水的铜温壶可分为两类。一类通体素面无纹，唇口下接蒜头部分，颈部相对粗短，足底铸刻四字铭文“宜尔子孙”〔图五：1〕。同船出水的龙泉青瓷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器类〔图五：2〕。此即文献提及的素温壶，与《重修宣和博古图》中图示的汉器十分相似〔图五：4〕。这种铜素温壶在宋元窖藏和遗址中有广泛发现：其中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4件〔图五：3〕‹2›；福建南平窖藏出土4件‹3›；四川广安窖藏出土2件‹4›。另一类器形较为挺拔，蒜头相对短小，口沿和蒜头相接处有明显收束，颈部更为细长；肩饰蝉纹，腹部为回首鹦鹉和龟背纹〔图五：5〕。浙江海宁智标塔地宫发现2件相似铜器‹5›，器底铸刻“子子孙孙永宝用”；安放在簋式香炉两侧，作佛像前供奉之用〔图五：6〕。这种温壶在日本14－16世纪的花道文献中多有提及，名为“柑子口”，见诸庆长二年池坊专好《花书转》和天文二十三年《立花图卷》。出土文物以群马县藤冈市上栗须寺前遗迹发现的铜器最具代表性‹6›，根据伴出的镰仓时代火舍香炉和14世纪的青瓷、白瓷推测，其为元代产品的可能性居多。传世品则推长崎县小值贺岛藤松家的传世铜器〔图五：8〕‹7›，其颈部缠绕螭龙的特殊造型也见于江西万安窖藏成对出土的铜器上〔图五：7〕‹8›。

新安模式之外，宋元遗址中还发现另一类型的铜温壶，与《宣和博古图》所示“汉山龙温壶”如出一辙〔图五：9〕。这一模式在衢州龙游南宋墓的随葬铜器中即有发现，其唇口下接轮状突起一周，

‹1›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二：“夫尊以壶为下，盖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又（清）林伯桐：《士人家仪考》卷四，《祭仪考证》，“祭器不宜轻忽考”条，“今之祭器皆非无本。毛大可曰‘壶即尊也，名壶者以瓠可为尊。’”《丛书集成》三编，卷二五，页479。

‹2› 转引自前揭《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越地范金》，页104。

‹3› 前揭《福建南平窖藏铜器》，图一：8，封三：4。

‹4› 李明高：《广安县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页67－70，图六。两件铜器表面均有髹漆，其中一件底部铸有隶书“秘阁”二字，另一件为“芗林”。

‹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宁智标塔》页31－32,64－67，图五二、五三，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日］坂井隆等：《上栗须寺前遗迹群》Ⅲ，群马：群马县教育委员会等，转引自前揭《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西南沉船返航的性质》，页148。

‹7› 转引自前揭《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西南沉船返航的性质》，页147－148，图一七。

‹8› 谢基梁：《江西万安窖藏出土的青铜器》，《江西文物》1991年第1期，页110－111。

书籍1.indb 77 14-11-20 下午2:10

〔图五〕温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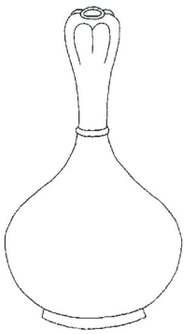
图五:1　新安沉船出水铜温壶



图五:2　新安沉船出水青瓷温壶



图五:3　杭州武林门外出土铜温壶



图五:4《重修宣和博古图》汉素温壶



图五:5　新安沉船出水铜温壶



图五:6　海宁智标塔出土铜温壶



图五:7　江西万安窖藏出土铜温壶



图五:8　长崎小值贺私人藏铜温壶



图五:9《重修宣和博古图》汉山龙温壶



图五:10　浙江龙游南宋墓出土铜温壶



图五:11　日本藏南宋铜温壶

壶身分层装饰江涛瑞兽纹‹1›；〔图五：10〕完全一致的例证也见诸日本的传世文物〔图五：11〕‹2›。

2. 投壶

《三礼图集注》记，“投壶者，大夫、士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器物口沿齐平处左右各出一筒形耳，壶身直口、长颈、鼓腹。新安沉船的青铜投壶仅存上半部，可见分段铸造的痕迹，下腹和底足残失〔图六：1〕。分段铸造、焊接是宋元铜壶瓶的典型成形方式，我们或可从13世纪末福建泰宁窖藏出土的鎏金银投壶中推测这件新安器的完整造型〔图六：3〕‹3›。这种鼓腹、圈足的投壶样式也多见于同时代的瓷器产品，如新安沉船同船出水的白瓷投壶〔图六：4〕和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的2件哥窑文物〔图六：5〕‹4›。日本收藏有一对锡制带座投壶，底座下接三云形足〔图六：2〕‹5›，这为新安青

‹1› 郑嘉励：《龙游宋墓出土的一组文房用品》，《东方博物》2007年第3期，页46－49。

‹2› [日]中野彻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元》，第7卷，插图166，东京：小学馆，1999年。

‹3› 前揭《福建泰宁窖藏银器》，页67，图九：4。

‹4›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7期，页54－60，图版四：2。

‹5› [日]嶋田英诚等编：《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南宋金》第6卷，图版197，东京：小学馆，2004年。

书籍1.indb 78　14-11-20 下午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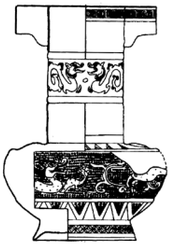
〔图六〕投壶



图六:1　新安沉船出水青铜投壶



图六:2　日本藏元代锡唐草纹投壶形瓶



图六：3　福建泰宁窖藏出土镀金银投壶 元初



图六：4　新安沉船出水白瓷投壶



图六：5　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青瓷投壶 14世纪中

铜投壶下半部的造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3. 贯耳壶

贯耳壶和投壶相类，只是双管耳下移至颈部，且器身相对瘦长。新安沉船出水文物中共整理出7件铜贯耳壶，除一件素面外，其余均两两成对。其中最精致的一对截面呈扁椭圆形，鼓腹，高圈足；由上至下被多道宽弦纹分为若干装饰纹带，地纹为繁密的雷纹与写实波涛纹，主体图案为饕餮纹〔图七：1〕。福建南平窖藏集中出土有10件同类文物，其造型和纹样布局与新安遗物完全一致〔图七：2〕。相似的例子在日本也有发现，新泻县伊达八幡遗迹曾出土一件青铜贯耳壶，年代在12－13世纪〔图七：3〕‹1›。

这种器身扁圆的贯耳壶类型在宋元各类遗迹中发现较广，材质涵盖了铜、陶、瓷等不同工艺门类。江西宜春窖藏发现的一对铜壶‹2›，颈部和器足均饰海浪纹，腹部以云雷纹为地，铸兽面纹：纹样布局和新安铜器基本一致，只是颈部略粗。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和市汽车站工地遗址分别发现了此类铜壶和范铸而成的陶壶，颈、腹比例及图案布局均与宜春窖藏类似，反映出此类仿古器物的生产很可能具有共同范本‹3›。这种源自商周铜器的器形在《重修宣和博古图》中亦有辑录，只是整体较为宽扁〔图七：4〕；而海盐镇海塔地宫和浙江湖州莫愁乡王家潭窖藏〔图七：5〕发现的铜壶恰是《博古图》范式的忠实再现‹4›。日本福井县一成谷朝仓遗迹出土的青瓷贯耳壶则是这种宽扁类型的典型瓷器标本〔图七：6〕。

‹1›　［日］菅沼亘等：《伊达八幡馆遗迹发掘调查报告》，新泻：十日町市教育委员会，2005年，转引自前揭《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西南沉船返航的性质》。

‹2›　前揭《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简报》，图一；文中所用清晰版图片资源转引自前揭《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页149，图二五：1。

‹3›　武林门城墙下出土铜贯耳壶见前揭《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越地范金》，页102；市汽车站工地遗址出土陶贯耳壶见沈一东：《南宋官窑陶质祭器器物属性探析》，《东方博物》2010年第1期，页52，图五。

‹4›　前揭《海盐镇海塔及出土文物》，页37，图三十七；蔡玫芬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页66，图版I－13，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

书籍1.indb 79　14-11-20 下午2:10

〔图七〕贯耳壶



图七：1　新安沉船出水铜贯耳壶



图七：2　福建南平窖藏出土铜贯耳壶



图七:3　日本新泻伊达八幡遗迹出土铜贯耳壶



图七:4《重修宣和博古图》"商贯耳弓壶"



图七：5　浙江湖州王家潭出土铜贯耳壶



图七:6　日本福井一成谷朝仓遗迹出土青瓷贯耳壶

3. 环耳壶

环耳壶造型与贯耳壶基本一致，唯耳部作兽首衔环状，《重修宣和博古图》述其为"两耳连环"、"耳作牺首"〔图八：1〕。除牺首外，传世或出土的宋元环耳壶亦有龙首、象首、鱼形等耳部装饰。新安沉船共出水2件完整的铜环耳壶〔图八：2〕和多件相似器形的青白瓷〔图八：3〕，均为直口长颈，龙耳衔环，壶身扁圆；相同器形的铜器在江西宜春窖藏也有发现〔图八：4〕，壶身轮廓、环耳细节以及颈部两周凸弦纹等特征均与新安遗物如出一辙。

除新安模式外，宋元阶段的环耳壶还有一类盘口、束颈、垂腹明显的扁壶造型，广泛发现于13－15世纪的窖藏、墓葬中。江西万安窖藏和四川三台窖藏〔图八：5〕‹1›均成对出土此类铜扁壶，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同类元代文物〔图八：6〕‹2›。这种仿古器形一直到15世纪前期仍有延用，南京明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就出土一对此类环耳铜扁壶〔图八：7〕‹3›，样制与万安、三台窖藏无二。日本福井一乘谷遗址的出土物中也有这种盘口造型的青瓷环耳扁壶〔图八：8〕，应为朝仓大名收藏赏鉴的唐物舶来品，大致年代在15世纪后期‹4›。

将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中国宋元遗迹出土器和日本所见文物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现象：其一，新安沉船出水的仿古器类广泛发现于中国宋元遗迹中，其造型、纹样和铭文细节也可在这些遗迹出土物中找到相类、甚至完全一致的例子。其二，这批新安遗物所代表的器类、造型及纹样

‹1›　景竹友：《三台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页59－63，封三：图十一。简报虽将窖藏年代界定为南宋，但据窖藏文物特征推定，其应属元代。关于这一问题，刘毅曾据窖藏瓷器特征进行论证(刘毅等：《三台窖藏时代商榷》，《四川文物》1994年第12期，页49－50)。

‹2›　石守谦等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页121，图IV－4，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

‹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文物》2010年第3期，页25－27，图五：1，图九。刘渊然为元末明初的道教领袖，据史载祠记，其葬于宣德七年(1432)，由此可框定墓中出土物的大致年代。

‹4›　转引自前揭《陶磁器の文化史》，页92，图版27。

书籍1.indb 80　14-11-20 下午2:10

〔图八〕环耳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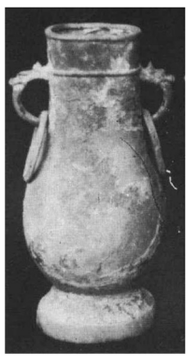
图八:1 《重修宣和博古图》"周仲丁壶"



图八:2 新安沉船出水环耳铜壶



图八:3 新安沉船出水青白瓷环耳壶



图八:4 江西宜春窖藏出土环耳铜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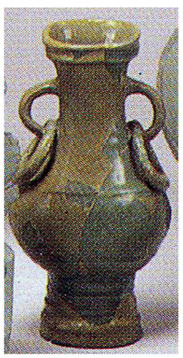
图八:5 四川三台窖藏出土铜环耳壶



图八:6 台北故宫藏元铜环耳壶



图八:7 南京西善桥明墓出土铜壶



图八:8.日本福井一乘谷出土青瓷壶

特征也同样出现在日本传世和出土的唐物中。建长寺、净光寺、称名寺等寺社和私人家族保藏品中不乏此类来自中国的仿古瓷、铜文物；载录镰仓寺院账物和战国大名收藏品的文献、绘词中也频频可见其身影；同时日本多处佛寺、墓葬或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品中亦有一批与可新安遗物对应的文物。其三，就器类的丰富程度而言，中国宋元窖藏和宗教遗迹中发现的仿古器更为多样，炉瓶之属外，还包括了簠、簋、甑、甗、盥、罍、尊等各类样制；而新安遗物和日本所见的相关文化财仅以香炉、壶瓶、灯台(蜡)和钟、铃、钹等乐器为主[表一]。

[表一]新安沉船与宋元遗址发现铜器一览表

出土单位	熏炉	鼎式炉	鬲式炉	方炉	兽形炉	蜡台	簠/簋	盥	甗/甑	罍	贯耳壶	环耳壶	温壶	瓶/觯	琮瓶	觚	尊	爵	磬	钟	铃	钹
新安沉船	○	○	○	○	狮	○					○	○	○	○		○		○			○	○
福建南平窖藏	○	○	○	○	狮		○	○	○	○	○	○	○	○	○	○		○	○	○		
江西宜春窖藏	○	○	○		狮						○	○		○					○			

书籍1.indb 81 14-11-20 下午2:10

［**续表一**］

四川简阳墓葬/窖藏	○	○				龟鹤			○		○	○	○扁	○		○			○	○	○	
海盐镇海塔			○		狮		○				○								○	○		
海宁智标塔							○						○									
杭州浙大新村			○																			
四川三台东河纸厂窖藏		○										○										
四川三台南河路窖藏		○										○		○				○				○
四川江油大康乡窖藏						龟鹤			○		○			○								○
四川江油河西乡窖藏						○								○		○					○	
四川江油彰明窖藏	○	○				○								○	○			○				
四川江油厚坝镇窖藏									○			○										
四川广安广福乡窖藏		○		○		○						○	○	○	○	○	○			○		
江西万安窖藏		○				鹤					○	○	○									○
四川大邑窖藏						○								○		○						
四川巴中窖藏						○						○										
四川剑阁窖藏	○			○		○						○		○		○	○	○				
杭州武林门外城墙			○	○							○		○					○				

表格注释：■标示出来的出土单位代表宗教性质的遗迹。

针对这些异同现象，我们或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沉船出水文物与中国及日本的传世、出土品一致性，以此推断，中国应是这批仿古器的产出地，而日本对此类手工艺品具有较大的消费需求，是沉船仿古器的重要输出地。第二，新安类型的仿古铜瓷船货在中国遗存丰富，且出土遗迹性质多样，使用阶层上至宫廷皇室，下至普通士庶；则沉船出水的仿古器物应为当时广泛流通的大宗商品，而非专供日本市场的来样订制。第三，新安遗物以炉、瓶为大宗而不见簠簋甑甗，反映出此类船货并不是随意购置，而是日本为应对国内需求的选择性采买。要之，新安沉船装载的仿古类器物，

书籍1.indb 82 14-11-20 下午2:10

应是以日本东福寺为代表的寺院按照特定订单，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中国大宗商品中采购而得。

需要注意的是，自宋以来，输入日本的舶来唐物常常存在功用当地化的现象[1]。以日本为目的地的新安仿古船货在器物组合、使用场合和功用性质上又是怎样的呢？

二　供奉与雅玩：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的功用

作为由寺社贸易形式销往日本的舶来唐物，新安船货中仿古器物的功用又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一问题，沉船起讫地点发现的同类遗物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沉船出水的仿古器以香炉、壶（瓶）类器物最为大宗。下文以之为例，通过比对中国和日本相关文物所在地的性质，考证文献、绘词，并以同船其他船货和文字材料为旁证，探析新安沉船仿古炉瓶在使用场合和组合样态上的多种可能性。

（一）供养之具

新安沉船出水的仿古炉、瓶在造型与纹样装饰上均可在中日出土和传世品中找到十分相似的文物；其中不乏出土遗迹性质明确、保藏历史传承有序的例证，甚至有直接证明使用场合和器物功用的铭文或题款。同时，沉船中大量出水的货签墨书也留下了考订仿古船货适销群体的线索。这些均可作为我们推断新安沉船中仿古瓷、铜炉瓶性质功用的重要参考。

1. 宋元遗迹的线索

在对新安沉船炉瓶器物的分类中，我们发现出水的仿古器类基本可在宋元遗迹中找到一致的类比对象；而对这些中国出土品所在遗迹性质的梳理就成为推测其性质功用的关键。宋元时期集中出土仿古炉瓶的遗迹多为窖藏、塔基或地（天）宫，集中分布在江浙、四川、江西和福建地区，尤以四川三台、江油、剑阁等地最为典型。通过分析遗迹所在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和铭文题款信息，大致可推定其中仿古炉瓶的的性质与功用。

其一，遗迹的人文地理环境。除去海盐镇海塔天宫、地宫和海宁智标塔地宫这两处性质明确的出土单位，集中出土仿古炉瓶的宋元窖藏遗迹有相当一部分地处已毁道观、寺院的遗址附近或宗教废墟中[2]；窖藏形成原因除战争因素外，更可能与当地宗教势力的兴盛有关[3]。此类窖藏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如江油地区的厚坝镇窖藏[4]发现于当地犀牛寺正殿前院落内，河西乡窖藏[5]和大康

‹1›　如中国南方生产的四系瓷罐在日本经冢遗迹中的用途完全有别中国，转作经筒或骨壶之用。谢明良有专文论及这一问题，详见谢明良：《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及其有关问题》，《贸易陶瓷与文化史》，页71－73，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

‹2›　史占扬：《重要的考古成果·珍贵的出土文物——四川古代窖藏所记》，《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页21。

‹3›　母学勇：《剑阁宋代窖藏综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页15。

‹4›　黄石林：《江油发现精美宋代窖藏铜器》，《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页8－9。

‹5›　曾昌林：《江油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页74－75。

书籍1.indb 83　14-11-20 下午2:10

乡窖藏‹1›分别位于龙泉寺和白果寺遗址中，三台南河路窖藏‹2›地处牛头山和蟠龙山大型寺院遗址周边。此外，还有些窖藏所在地的古地名本身就有宗教意味，如江西宜春窖藏区域旧名“神窝里”，意即庙宇毕集之处。

综上，我们不难推知出土有仿古器物的宋元窖藏相当一部分与寺观遗迹相关；那么，这些宗教遗迹中发现的仿古炉瓶具体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我们可从相关文物上的文字资料管窥一二。

其二，文物的铭文题记资料。江西宜春窖藏出土的两件鬲式铜炉铸有铭文“大德癸卯年，郡北祈求会新造过锡器，外续置铜香炉肆个，永充供养”，可见其应在当地教团活动中充作进香供奉之用。而该窖藏同出的鼎炉、贯耳瓶、环耳瓶等仿古器也当为同一宗教团体的供器。四川江油彰明窖藏出土有“天迎会”铜印‹3›一枚，暗示着该窖藏仿古铜炉、瓶民间寺社供器的性质。仿古炉瓶也用作佛前供养，藏于大维德基金会的至正十一年(1351)铭青花龙纹象耳对瓶就是典型例证。瓷瓶颈上钴料题写“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明确指出这对环耳壶用作佛前插花供器的属性。此外，福建南平窖藏出土有“太清宫”铭文铜钟、道教铜镜、铜龙等科仪法器，四川剑阁小东街窖藏则发现了“道经师宝”印则，这些均展示出上述窖藏所出仿古炉瓶涉及道观宗教供奉活动的可能性。

除用于宗教场所，作为“香花供养”的仿古炉瓶在宋元阶段也在皇家‹4›和庶民的祭祀和丧葬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陕西甘泉柳河湾村明昌七年(1196)金墓‹5›东北壁的彩绘，为宋元时期的炉瓶功用提供了明确的注脚：女供养人手捧仿古铜花瓶，男供养人手持鹊尾香炉，居中“香花供养”四字即是墓葬中炉瓶功用的最好阐释。河南林县金墓出土的一件三彩盒，盖内墨绘壶瓶插花、鼎炉焚香的场景，并伴有“花瓶、香合”的文字注解‹6›，也可为证。

由是观之，宋元遗迹出土的仿古铜、瓷炉瓶多数与宗教供奉和民间丧祭活动相关，在佛道寺观、民间教团与士庶墓葬中往往充作“香花供养”之用。

那么，作为输往日本的舶来品，新安遗物中的仿古船货在功用上与中国的同类器物是否一致呢？这就要借助沉船出水木简上的文字信息和日本现存的相关文物来判定。

‹1› 黄石林：《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页63－66。

‹2› 景竹友：《三台出土元代窖藏》，《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页62－65。

‹3› 江油县文保所：《四川江油县发现宋代窖藏》，《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页52－55。

‹4› 《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礼一三・神御殿》:“(淳熙)十六年七月二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大祥前，依礼例合塑制神御三位……各位各用腰舆、香案、香炉、匙盒、花瓶、黄罗缴扇，令塑制所依名件制造，合差内侍官一员克都大主管于至日迎赴景灵宫安奉，并从之。”

‹5› 甘泉县博物馆：《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文物》2009年第7期。

‹6› 张增午：《河南林县金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书籍1.indb 84 14-11-20 下午2:10

2. 沉船遗物的推演

根据上世纪80年代韩国提供的数据，新安沉船中发现有364枚货签木简，49枚有墨书明确提及了“东福寺”、“钓寂庵”、“筥崎宫”等日本寺社名称。其中题有“东福寺公用”或“东福寺公物”的木简计41枚；5枚记有“钓寂庵”的字样。钓寂庵是当时博多承天寺的塔头，而承天寺又是东福寺的末寺。另有3枚木简涉及到“筥崎奉加钱”，“筥崎”为筥崎八播宫神社，位于今日本福冈市东区箱崎。‹1›这些文字资料说明，新安船货很可能与日本东福寺等寺社有密切关系‹2›。

这批与日本寺社密切相关的仿古炉瓶在抵达目的地后的具体功用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发现的同类文物与相关文献来进一步论证。

3. 日本文物的佐证

以铜炉、瓶供器为例，来自中国的仿古舶来品既广泛发现于镰仓至战国时期的佛寺遗迹中，也是日本佛寺、神社传承有序的保藏品。其中寺社遗迹出土品有来自崎玉县上里町大光寺遗址和东京都石川县辰口町德山寺遗迹的三足铜鼎炉、新泻县伊达八幡宫遗迹的铜贯耳瓶、群马县藤冈市上栗须寺前遗迹的铜温壶等‹3›。著名寺院的传世品则有兵库县太山寺旧藏的铜环耳瓶、滋贺县圣众来迎寺的铜方炉，以及京都建仁寺本院内的小寺——正传永源院收藏的觚形铜花瓶。

实物例证之外，文献和绘词中也不乏仿古炉瓶用作香花供养的文图记载。西本愿寺《慕归绘词》第八卷中，描绘着列陈于供案上的青瓷尊式瓶和奁式炉，瓶中插花，炉内焚香。镰仓圆觉寺塔头的《佛日庵公务目录》则记载了众多14世纪中期的中国舶来品‹4›，目录中提及的“青瓷花瓶”、“古铜花瓶”和“香吕（香炉）”，均可与新安船货一一对应，是日本寺社从中国采办仿古香花容器的又一明证〔图十一〕。

在论证仿古炉瓶供器功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中日所见文物，还是传世绘词资料，都展示出仿古炉瓶具有一定的搭配方式：或为一炉二瓶搭配，或为花瓶、香炉、烛台组合。从中或可归纳出仿古炉瓶作为香花之具相对固定的组合样态。

4. 香花供器的组合

如果统计新安遗物中仿古金属香炉和壶瓶的数量，就会发现香炉基本为单数，而壶瓶通常成对存在，且数量多为香炉的两倍；同时伴出较为丰富的蜡台或灯台：这种现象实际反映出炉瓶之属相

‹1› 江静：《再谈新安沉船》，《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日]冈内三真：《断安沉船出土的木简》，《东亚的考古与历史：冈崎敬先生退纪念论集》，京都：同朋舍，1987年；[日]大解和雄编：《桩仓时代文化传摇的研究》，京都：吉川弘文馆，1993年。

‹2› 除炉瓶之具玩，新安沉船中成套出水的钵、钹、锣、小锺、铃等乐器的完整组合也被认为是日本寺社进行佛教仪式的用具。目前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为韩国学者，相关成果见[韩]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14世纪初东亚洲交易的诸问题——新安沉船的历史背景》，《新安船和东亚洲的陶瓷贸易》，2006年；[韩]金炳堇：《以水下考古学研究东亚洲交易关系：以新安海底遗物为主》，韩国建国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青铜仿古乐器组合也出土于中国宋元宗教类窖藏中，详见[表一]。

‹3› 此处言及的日本出土仿古青铜香炉、花瓶均转引自前揭《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以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

‹4› 转引自[日]村井章介：《文化は貿易船に乘って—镰倉時代の日中交流—》，《日本の美術》410号，东京：至文堂，2000年。

书籍1.indb 85 14-11-20 下午2:10

〔图九〕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吕后祭汉王图中的供器：香炉、花瓶



〔图十〕《慕归绘词》中的三具足　第八卷　日本西本愿寺藏 1351



对固定的组合关系，而这种组合的具体形式可通过比对中国和日本的相关文物获得清晰认知。

宋元遗址中一炉二瓶的铜器组合十分常见，名为三供。福建南平窖藏和江西宜春窖藏中均可见仿古鼎炉与成对贯耳壶、环耳壶的搭配；海宁智标塔地宫一佛二弟子的铜像前，也可见簋式铜炉居中、铜温壶分列左右的情况。这种三供组合作为宗教供奉的同时，也充当着祭奉先人的祭器或随葬明器。元至治年间刊刻的《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中就有炉瓶三供祭祀逝者的场景〔图九〕‹1›。陶瓷三供也广泛发现于宋元窖藏和墓葬中，如湖南常德元代遗址和江西萍乡窖藏均出土一套连座青花炉瓶三供；其中常德瓷炉与新安沉船中的瓷、铜狻猊出香十分相似，萍乡出土花瓶底部墨书的“宗位”二字，则表明这组青花三供摆放于先人神主前的祭供性质‹2›。山西金元墓中的陶、木明器则提供了仿古炉瓶的另一类组合形式：在一炉二瓶的基础上又增加蜡（灯）台两具，形成了香炉居中，其他四件左右排开的对称摆陈模式，称为五供‹3›。

自宋以来，一炉二瓶的组合逐渐成为佛前香花供奉的主要样式；并随着入华日本僧人的传播，影响到日本寺社的供器组合样态。14至15 世纪，“三具足”和“五具足”在日本寺社供器和瘗埋类祭器中十分流行。三具足，是香炉、花瓶、蜡（灯）台各一，五具足与中国五供一致。《慕归绘词》中就展示了14世纪日本寺院陈设青瓷香炉、花瓶和铜蜡台的场景〔图十〕。这套铜、瓷混搭的三具足可在新安沉船遗物中找到一致的例子〔图十一〕。全套中国瓷器组成的三具足在日本著名寺社的传世旧藏中也较为普遍，清净光寺和称名寺保藏的烛台、香炉和花瓶均为龙泉青瓷〔图十二〕；相同造型的人物烛台、奁式炉和尊形瓶同样也见诸新安陶瓷船货中。除了寺社旧藏，三具足作为瘗埋祭器也发现于日本13－15世纪的遗址中，如东京都荣町遗址L区55号的土坑中就曾发

‹1›　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前汉书续集》卷下，页341，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

‹2›　萍乡市博物馆：《萍乡市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页46－48。

‹3›　这些陶、木五供分别出土于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北郊冯道真与王青墓、西郊宋庄墓。大同文化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页87－90；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页42－46；王银田等：《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页27－30。

书籍1.indb 86　14-11-20 下午2:10

现一组青铜三具足〔图十三〕，由三足鼎式炉、觚式花瓶和蜡台组成；其器物样式与新安沉船出水文物十分相似。这种仿古炉壶的组合在日本需求颇盛，从中国大批输入之外，当地也以龙泉和福建青瓷为原型进行了仿制。大光寺裹遗迹就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青瓷套式香炉和日本仿烧的古濑户青瓷瓶共用的情况。

综上，仿古炉瓶在13－15世纪的中日两国常常用作供奉祭祀的香花之具，其与烛(灯)台搭配，形成了三(五)供和三(五)具足的组合样态。然而，在整理日本涉及"三供"或三具足的文献、绘词时，我们发现炉瓶组合有时也陈设于挂轴画案前，用作厅堂、书斋的装饰[1]；这为新安遗物中仿古炉瓶的功用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二）清赏之具

考据文献，炉瓶除用作香花供奉，也是燕闲清赏的重要组合，装点于厅室、书斋，并根据陈设环境的不同配合选择相应体量，"大者陈于厅堂，小者置之斋室"[2]。新安沉船出水的瓷、铜仿古炉瓶，无论是鼎式炉、鬲式炉，还是环耳壶和温壶，都表现出"造型相同、尺寸各异"的现象〔图十四〕，恰恰为上述文献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注脚。而《遵生八笺》中仿古陈设器的丰富造型，如古铜花觚、尊、鼎、觯、古素温壶、弓耳壶等，也可与新安遗物一一对应。此外，同船伴出有各类材质的砚滴、笔架、砚墨和挂画轴头等文玩用品和茶具组合，提供了这批炉瓶船货用于书斋清赏、点茶焚香的侧面证据。

通过对中日两国相关文物使用情况的分析和同船其他文玩

〔图十一〕新安沉船出水三具足



〔图十二〕日本寺院藏青瓷三具足



图十二:1　日本清净光寺藏青瓷人物烛台　图十二:2　日本称名寺藏青瓷花瓶　图十二:3　日本清净光寺藏青瓷香炉

〔图十三〕日本东京荣町遗址出土铜三具足



‹1›　《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慕归绘词》均展示了挂轴前桌案上摆陈炉瓶之事的场景，下文详述。

‹2›　《遵生八笺》在谈及"燕闲清赏"时，论及古铜器之鼎鬲、尊壶、觯觚之属在明代多做香花之具，用以焚香、插花。这种将仿古器形用作文玩清供的传统，应该是对宋元审美好尚的承继与延续。见(明)高濂：《遵生八笺》卷一四"论古铜器具取用"条："上古铜物存于今日，聊以适用数者论之。鼎者，古之食器也…今用为焚香具者，以今不用鼎供耳。然鼎之大小有两用，大者陈于厅堂，小者置之斋室。…觚尊觯，皆酒器也。三器俱可插花。…若古素温壶，口如蒜榔式者，俗云蒜蒲瓶，乃古壶也。…他如栗纹四环壶、方壶、匾壶、弓耳壶，俱宜书室插花，以花之多寡合宜。"，卷十六"瓶花之宜"条："瓶花之宜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太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傍或置几上，与堂相宜……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高低二种八卦方瓶、茄袋瓶、龙泉窑瓶，次则古铜花觚、铜觯、小尊罍、方壶、素温窑匾壶俱可插花。"

书籍1.indb 87　14-11-20 下午2:10

〔图十四〕新安沉船出水尺寸各异的青瓷炉、瓶



清供用品的参考援引，我们会对新安沉船中仿古炉瓶用的清赏功用与组合模式有进一步认知。

1. 文雅与复古：宋元遗迹中的炉瓶陈设

宋元阶段的仿古炉瓶既集中发现于宗教遗迹，也频频出土于南方墓葬中，材质上瓷、铜并用，造型上涵盖了见诸新安遗物的所有器形。其中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妇墓、浙江衢州史绳祖墓、浙江龙游南宋家族墓、浙江平阳宋墓中均以仿古铜器为主；上海青浦任氏家族墓和杭州元代鲜于枢墓‹1›则以瓷质的香炉、壶瓶组合更为典型。

这批随葬复古炉瓶的墓主多属南方文人，埋入生前复古玩好是这其葬品的重要特征。这些炉瓶之属很可能曾装点过墓主的厅堂、书斋，用以蹴香插花‹2›；体现着南方文儒的复古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与铜、瓷炉瓶伴出的还有砚滴、笔山、画轴、印章、砚台等文房雅具，以及铫子、盏托等点茶之具‹3›。参考这一时期的诗词咏赋、文人画作和笔记文集，可知13－14世纪苏浙松江一代的文士之风逐渐成为左右工艺品面貌的主导力量；精雅淳古代表着文人对日用和赏玩用品的要求。鼎彝造型的香炉、花瓶，配合砚滴、笔山等精致文玩，恰是当时宋元文人书斋的陈设所好‹4›。加上茶香袅袅、书画几帧，共同营造出充满文士之风的雅致空间。正如宋代诗词中描述的书斋画面:“画展江南山景两三幅。彝鼎烧异香，胆瓶插嫩菊。”‹5›那么，这种仿古炉瓶用作燕闲清赏的风尚，是否对日本的社会审美有所影响呢？

2. 唐物鉴藏：日本上层的舶来陈设

通过记载贵族宅邸陈设的文献和绘词，我们发现在日本镰仓、室町与战国时代，来自中国的仿古香炉、花瓶既用于寺社供养，更是13－15世纪武士门第的贵族邸宅展示威信和财富的重要标志。

《室町殿行幸御饰记》记录了永享九年(1432)室町幕府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向天皇展示的唐物雅玩品，其中就有胡铜花瓶、黄铜香炉等金属清供。记录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御所陈设及茶道器皿的《君台观左右帐记》，也留下了仿古鼎式香炉和觚式花瓶的图文记录。而根据考古发现和《朝仓义景亭御成记》共同复原的福井一乘谷朝仓馆址表明，在15世纪后期，舶来的宋元花瓶、香炉作为大名宅邸的重要座敷饰，通常摆放在挂轴前的画案上，是代表大名身份的“威信财”，也是武家文化的

‹1› 张玉兰:《杭州市发现元代鲜于枢墓》,《文物》1990年第9期，页22－25。

‹2› (明)周祈:《明义考》:“今之炉，古鼎也；今之瓶，古觚也。得二器者无所用，以蹴香插花，谓之炉瓶。”

‹3› 蔡玫芬在论及蒙元时期南方文儒群体的仿古之风对此有专论，见蔡玫芬:《转型与启发：浅论陶瓷所呈现的蒙元文化》，前揭《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页233－235。

‹4› 详见扬之水:《两宋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页48－65；前揭《两宋香炉源流》，页46－68。

‹5› (宋)曾慥辑，陆三强校点：《乐府雅词·拾遗上》页187，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书籍1.indb 88 14-11-20 下午2:10

重要象征‹1›。

13－15世纪日本流行的仿古炉瓶陈设器又有着怎样的组合形式呢？索视《慕归绘词》、《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朝仓义景亭御成记》可见，一炉二瓶和三具足除用以佛前供养，有时也陈列于厅堂、书斋；此外，香炉、香盒与匙瓶所代表的另一种组合，更与画轴、文房、茶具一并，成为风雅生活的重要点缀。

3. 炉瓶三事：陈设清供的组合模式

事实上，香炉、花瓶和匙箸容器的组合在两宋已出现。南宋帝王神御殿的祭祀礼器中就有摆放在香案上的香炉、匙盒与花瓶‹2›。士庶家礼的禫祭和虞祭活动则在香桌上"置香炉、香合、香匙"‹3›；山西临县金墓的三彩香盒墨绘，也展示了花瓶、香炉、香盒的组合模式。这些文献和图像资料均说明，宋元时期香炉、花瓶与香匙或香盒的搭配多用于供奉和祭祀场合。

明清以降，香炉、香盒与匙瓶构成的"炉瓶三事"正式确立了组合形态‹4›，多陈设于书斋、厅堂的案几之上，用作雅玩清供。记录明代室内陈设的《长物志》中，就提到了几案上香炉、香盒、香饼和箸瓶的组合模式‹5›；《遵生八笺》则反映了"香炉、匙瓶、香合"与书册、文玩共同营造的书斋环境‹6›。杜堇的《十八学士图屏》〔图十五：2〕和禹之鼎的《乔元之三好图》中，也描绘了仿古鼎式炉、觚形花瓶和贯耳壶造型的匙瓶并陈于书斋的场景。

这种炉瓶三事的陈设组合也对日本室町和江户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记述足利义政东山殿御所装饰的《小河殿并东山殿御饰记》为我们提供了炉瓶三事在香台上的陈设场景：以香炉为中心，圆形香盒和贯耳壶状的香匙瓶分列左右〔图十五：1〕。这一匙瓶形制与《遵生八笺》中以"古铜双耳小壶"‹7›作为书斋匙箸瓶的情况相符。江户时代的《雅游漫录》也描绘了炉瓶三事在书斋中的使用模式：书案上的鼎式炉、长颈香匙瓶与书卷、古琴交相辉映，案前地面上还摆陈有琮瓶造型的仿古花瓶〔图十五：3〕‹8›。

‹1› 详见谢明良：《十五至十六世纪日本的中国陶瓷鉴赏与收藏》，《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7期，页161－190。

‹2› 《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礼一三・神御殿》:"(淳熙)十六年七月二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大祥前，依礼例合塑制神御三位……各位各用腰舆、香案、香炉、匙盒、花瓶、黄罗缴扇，令塑制所依名件制造，合差内侍官一员克都大主管于至日迎赴景灵宫安奉，并从之。"

‹3› (宋)司马光：《书仪》卷九，页99、101、10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炉瓶三事者，即香炉、筋瓶、香盒三物，焚香必备之物也。"北京出版社，1992年。

‹5› (明)文震亨：《长物志》卷八"置炉"条："上置炉一，香盒大者一，置生熟香，小者二，置沉香、香饼之类。筋瓶一。"中华书局，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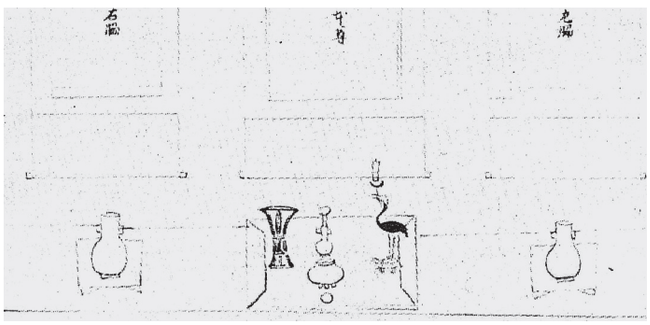
‹6› 前揭《遵生八笺》"香几"条："书案头所宜小几……斋中用以陈香炉、匙瓶、香合；或放一二卷册，或置清雅玩具，妙甚。"

‹7› 前揭《遵生八笺》卷一五"焚香七要"之"匙筋"条："匙筋惟南都(南京)白铜制者适用制佳。……余斋中有古铜双耳小壶，用之为瓶，甚有受用。"

‹8› 转引自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2005年23卷1期，图31，页461。

书籍1.indb 89 14-11-20 下午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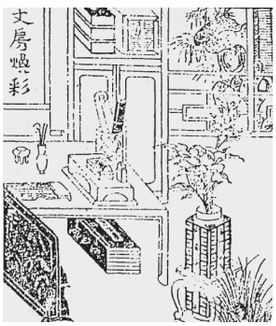
〔图十五〕炉瓶三式



图十五：1 《君台观左右帐记》之《小河殿并东山殿御事记》中描绘的炉瓶三事



图十五:2 明·杜堇《十八学士图屏》之炉瓶三事



图十五:3 江户时代《雅游漫录》之炉瓶三事

〔图十六〕香匙瓶与香筒



图十六:1 新安沉船出水铜匙、瓶



图十六:2 福州南宋许峻墓出土铜匙瓶



图十六：3 定陵出土锡匙瓶



图十六:4 日本藏江户时代香具组合中的香筒（左上）



图十六：5 新安沉船出水香筒

匙瓶在中日出土和传世品中也不乏实物例证。新安沉船出水的小铜瓶和铜匙筷，很可能就是搭配使用的香匙瓶组合〔图十六：1〕；这种长颈溜肩的铜瓶造型完全是《雅游漫录》中香匙瓶的再现。贯耳壶造型的匙瓶虽未发现考古实物，但从福州茶园山许峻墓和四川阆中窖藏觚、觯造型的匙瓶中‹1›，不难管窥这一阶段香匙容器的仿古趋势〔图十六：2〕。北京定陵出土有一式六件的锡匙箸瓶，直筒形，覆盆座，瓶口焊一匙二箸，腹部标签墨书“锡香匙筋瓶”等字样〔图十六：3〕‹2›。这种筒形带底座的香匙瓶也流行于日本，在江户时代的传世香具中，香筒通常与香炉、香盒一同盛放在大香盘中〔图十六：4〕‹3›。新安遗物中有一件残损镴器〔图十六：5〕，其口部的六角折沿与器腹的镂空装饰均与前述传世香筒一致。

我们还注意到，日本绘词中一炉二瓶的香具组合常常摆放在画轴前的几案上；而插置勺匙的仿

‹1›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页22－33，转2；张启明：《四川阆中县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页85－9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上册页180，下册图188，文物出版社，1990年。

‹3› 扬之水、郭学雷：《笔筒·诗筒·香筒》，《收藏家》2006年第3期，页35－37。

书籍1.indb 90 14-11-20 下午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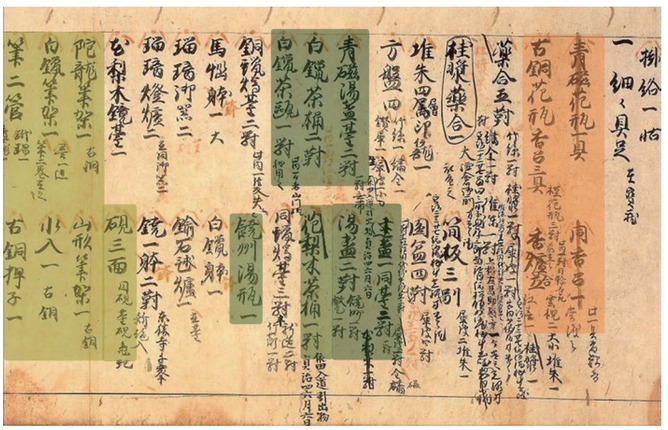
古小瓶也可转而用作茶道容器。这种现象反映出香炉、花瓶作为燕闲清赏，与文玩用品、茶道器用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些精雅之具，共同点缀着文人雅士的书斋、厅堂与庭院空间。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新安沉船中的丰富船货来加以证明。

4. 点茶挂画：新安船货的旁证

在讨论新安沉船出水仿古炉瓶的雅玩功用时，同船其他类型的船货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这些出水文物明显可辨识出茶具与文玩的不同组合。其与香花之具的炉瓶之属一并，生动演绎了宋元文人所推崇的风雅之事，所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上述”四般闲事”的舶来唐物也明确记录在与新安船年代相去不远的《佛日庵公物目录》中〔图二十〕。

其一，点茶之具。久保智康曾提到一件15－16世纪私人收藏的铜贯耳壶，盛放它的箱子内外分别有“古铜勺立/椭圆形”、“唐物茶勺立/耳地纹”字样的墨书。由此推知新安遗物中数量颇丰的瓷、铜贯耳壶除用作花瓶和香匙瓶，也可充当茶道里插放茶勺的“勺立”。室町时代《酒饭论绘卷》所勾勒的座敷棚陈设中，放置茶勺的觯形铜“勺立”清晰可见，觯瓶上的纹样与新安贯耳铜瓶的装饰十分相似。《君台观左右帐记》则展示了足利御所茶汤棚中的各色器用，其中“勺立”的器形与前述新安沉船出水的长颈小铜瓶一致〔图十七〕。[1]不仅仿古壶瓶可作茶具使用，新安遗物中还有明显属于点茶之具的文物，包括提梁锡质铫子、黑石茶磨、黑釉建盏、七里镇窑的研钵和褐釉茶入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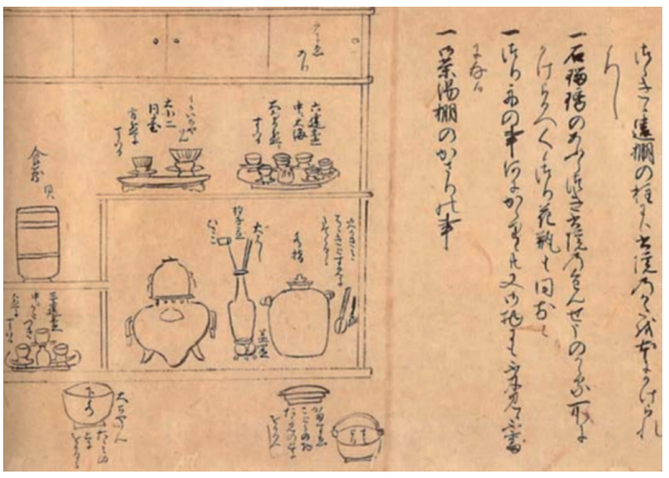
〔图二十〕《镰仓圆觉寺佛日庵公物目录》，贞治二年 1363



〔图十七〕茶瓶



图十七:1 《酒饭论绘卷》之座敷棚茶具 室町时代



图十七:2 《君台观左右帐记》之茶汤棚 日本国立历史博物馆藏 永禄三年(1560)

‹1› 转引自［韩］高美京：《新安沿船出水龙泉青瓷研究》，首尔：明知大学硕士论文，图Ⅲ.1-4.1，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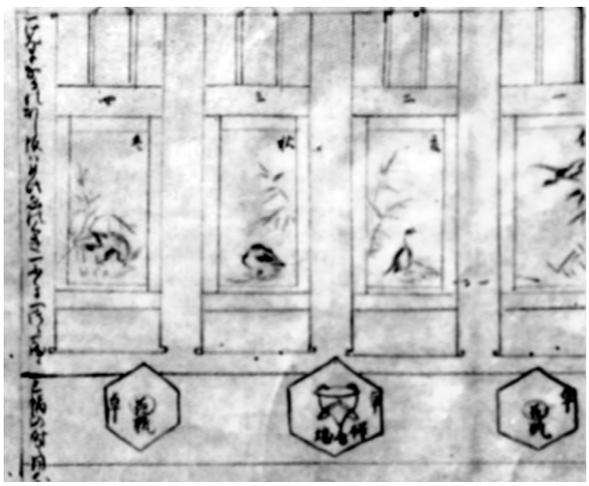
书籍1.indb 91 14-11-20 下午2:10

〔图十八〕新安沉船出水茶具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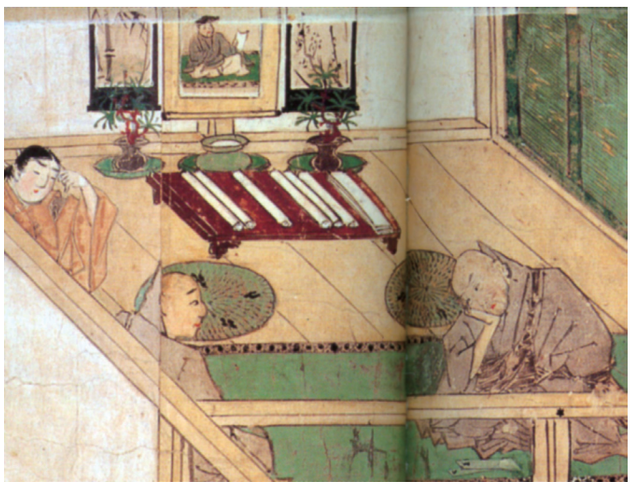


1.锡铫子　2.石磨　3.茶盏　4. 擂钵　5.茶入

〔图十九〕画轴与画案清供



图十九:1. 《君台观左右帐记》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1560



图十九:2 《慕归绘词》中的画轴与炉瓶清供　第5卷　日本西本愿寺藏　1351

十八〕。这些茶器组合在宋元之际传入日本，不仅作为国宝文化财传承有序，也广泛发现于室町至战国时代的遗迹中，如福井一乘谷遗址中就出土有相似的茶入、茶盏和茶筅。

其二，文玩之具。新安沉船出水文物中有一些木质画轴构件，其与同船的仿古炉瓶是否有关呢？《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慕归绘词》中，均描绘了这样的陈设情境：室内墙面上挂着三四幅图轴，画前陈设有一炉二瓶的香花雅玩之具〔图十九〕。这一场景恰恰生动再现了《洞天清录》中宋人书斋的挂画规制[1]，显示出炉瓶清供与香几(画几)、画轴搭配的陈列模式。而同船共出的砚滴、镇纸、笔架、砚台、墨条等文物〔图二十一〕，也提示我们仿古炉瓶用作清供雅玩的可能性。

‹1›　(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外五种》"古翰墨真迹辨·挂画"条：择画之名笔，一室止可三四轴……画前必设一小案以藉之，案上勿设障面之物，止宜香炉琴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书籍1.indb 92　14-11-20 下午2:11

〔图二十一〕新安沉船出水文房用具



图二十一:1　蟾蜍铜砚滴



图二十一:2　犀牛青瓷砚滴



图二十一:3　青白瓷牧牛砚滴



图二十一:4　青瓷鱼形砚滴



图二十一:5　陀龙铜笔架



图二十一:6　双牛石镇纸



图二十一:7　鸳形石砚



图二十一:8　各色墨条

结　语

新安沉船出水的仿古器物折射出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类金属、陶瓷船货以炉、壶为大宗，通过寺社贸易的形式输往日本。其器类既有圆鼎、方鼎、簋、鬲等古风香炉，也有温壶、贯耳壶、环耳壶等各色花瓶。在中国宋元遗存和日本传世及出土文物中，目前所见的13－15世纪的仿古炉瓶通常存在三供、五供、三具足、五具足、炉瓶三式等组合形式；这种仿古组合不仅用于寺社佛事，也用于装点贵族府邸；或供奉于宗教场所作香花供养，或陈设于厅堂书斋为文玩清赏。新安沉船仿古炉瓶组合的集中出水，既是中国南方宋元文士之风作用于手工业生产的时代投射，也反映出镰仓、室町时代日本社会武士贵族和高层僧侣集团对仿古和文雅风尚的追求。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张　露）

书籍1.indb 93　14-11-20 下午2:11